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自由与物役

——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的启示

冯 波

【摘 要】 本文认为，马克思从斯宾诺莎那里承袭而来的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了意志自由，而前者就是对内在必然性的遵从；马克思发展了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并将物化或物象化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马克思沿着斯宾诺莎通往自由的道路即外在必然性的内化思路，强调把物象化的力量重归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而非彻底消除物象化。因此，斯宾诺莎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乃至物化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斯宾诺莎 自由 必然性 物役 **【中图分类号】** B0-0

人们通常在康德或黑格尔的传统中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却很少有人把它置于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哲学的关联中来理解。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使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更加模糊不清。因为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以及在哲学上化解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马克思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教导，不如说真正的启迪来自于斯宾诺莎。康德并不像马克思与斯宾诺莎那样理解自由与必然性，而是要在现象与物自身、必然与自由之间截然二分；黑格尔虽然也在化解自由与必然性的矛盾，但他仍然坚持意志自由，而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则以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了意志自由。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吕贝尔说：“与斯宾诺莎一起而非与黑格尔一起，马克思试图调和必然性与自由。”（Rubel, p. 319）由此，什么是理性判断的自由，理性判断的自由又是如何与必然性相容的？这才是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自由观念的根本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之间相互格义才能得到回答。而且，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必然性，而是外物对人的奴役。马克思在此继承并发展了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创立了物化或物象化的学说。那么，马克思的物化、物象化概念具体如何继承并发展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的？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所强调的理性判断的自由对于物役乃至物化、物象化问题的解决，有何裨益？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意志自由

什么是自由？斯宾诺莎将自由定义为“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斯宾诺莎，1958年，第2页）所谓“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就是人的存在在于将其内在固有的规定性实现出来，即自我实现；“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就是说人的行为要由自己的判断所决定，即自我决定。总而言之，自由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的本质规定就是内在性，就是决不允许外物对人的存在的限制，也决不允许外物对人的行为

的强制，做到人为自身立法。但是，这种自由绝不是一种想怎样就怎样的任性，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也不是随意地想实现什么就实现什么、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它们还必须遵循某种必然性的法则，即人自身本性的必然性。

因此自由就表现在“自我立法”或自律上。人的存在所要实现的“自身本性的必然性”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或自身固有的法则，是生来就潜在于人之内的规定性；自由就在于实现人的固有人性或规定性，并且行动仅仅出于人的内在本性。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斯宾诺莎与康德、费希特等“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把道德的基础视为“人类精神的自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9页），虽然马克思从人的普遍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并不能否认个别的人具有独特的内在本性，毕竟处于同一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同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且马克思所要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实现每个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的本性或规定性。而以往我们总是忽视马克思对人的个性的维护，总是拿人的社会性来否定人的个性，结果就造成了忽视个性、损害个性的严重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一个人内在本性适于做一个诗人或音乐家，而他所掌握的生活资料却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农民或工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所导致的对人的强制，恰恰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使人的自我决定依附于特殊的社会生产领域，这些都是人不自由的表现。如果人的本质仅仅是社会关系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既然就是农民或工人的社会关系，他成为一个农民或工人就不是违背他本质的事情，农民和工人们又何必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如此，人的本质若仅仅是社会关系，那么人们就很容易认同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了。马克思并不是这么来理解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既包括社会性也包括个性，并且反对任何违背人的个性的社会关系。他说，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消除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自我实现的限制，使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打破分工的固定化后，人们在看似随意的劳动中才能真正认清自己内在的、潜在的规定性，并且在没有外在强制的前提下将其发挥出来。

康德也认为自由就是自律、自我立法，他说：“道德律仅仅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康德，第43-44页），所以马克思将斯宾诺莎与康德并称。但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与康德的自由概念具有十分重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自觉地选择了抛弃康德的道路而遵从斯宾诺莎。在康德那里，自由处于现象世界的彼岸，人们只有通过道德的勇气摆脱外在感官的禀好，才能实现自我立法的自由。康德的自由概念只是一个空洞的道德要求而非现实状态，并且康德也缺乏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自由的途径。与康德不同，斯宾诺莎强调，根本没有什么彼岸世界，本体世界内在于现象世界之中，神就是自然；自由的实现也决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空洞的口号，而应该从人的内在现实出发，从人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出发，“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斯宾诺莎，1958年，第105页）人的本质并不像神那样其本身就包含着存在，人只能努力保持其存在，这是人最基本的、最现实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的内在法则，所以要想实现自由，就必须从人保持其存在的努力着手，以人的物质生活为起点。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只有先保证了吃喝住行的基本需要，才会提出对自由的渴望。康德并不重视人的物质生活，相反，自由的实现就是要摆脱感官禀好，其后果便是忽略了自由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并没有沿着康德的道路前行，他像斯宾诺莎那样非常重视人的物质生活，并且把物质生产当作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赞赏斯宾诺莎对现实的强调，指出康德等道德论者对现实的蒙蔽，认为与康德相比，斯宾诺莎才是

“用人的眼光”、“从理性和经验出发”来看待人之生活的哲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页）

马克思不仅承袭了斯宾诺莎，而且还发展了斯宾诺莎。因为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内在本性只是自我保持的努力；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内在规定则要复杂得多，自我保持的努力只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包括各种能力的提高、平等的权利、尊严的承认等更高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但马克思从根本上还是沿着斯宾诺莎而非康德的道路前行，在马克思和斯宾诺莎那里，自由并非空洞的道德口号，并且他们都否定了道德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都强调了社会的内在法则、社会的自然进程对于实现自由的意义。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之上，生产力的进步、物质资料充分涌流是关键，只有到那时，工作日缩短到一定程度，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闲暇，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实现自我的内在规定。因此，“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2004年b，第929页）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康德“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等词汇，但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宾诺莎哲学，“自由王国”的实现绝不是通过道德意志的力量，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支配之上。因此，正如尤伟尔所说，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一样，“人性中所蕴含的解放将通过现实本身的内部运作和内在法则而实现，而不是像在康德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一样，通过给现实强加上的外在的道德意志而实现”。（Yovel, p. 98）

黑格尔虽然也把自由定义为“自我的自我规定”，但他仍然把自由视为意志的本质规定，把自由视为“意志的自由”。（黑格尔，第17页）虽然黑格尔一再强调自由意志有其具体的概念，即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任性，并不意味着意志能够摆脱一切客观必然性；他甚至说意志就是实践中的思维，“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同上，第12页）；但无论如何黑格尔都承认了意志的自由，把自由当作意志的本质规定。而斯宾诺莎却否定意志自由，否定自由是意志的本质规定，“意志不能说是自由因，只能说是必然的”。（斯宾诺莎，1958年，第29页）因为意志背后总有一个原因系列决定着它，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或被迫的。在此，马克思更多地继承了斯宾诺莎而非黑格尔。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抽象地否定意志自由，但他认定意志在许多重大的方面都是不自由的。比如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生产力的大小不是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取决于人们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人们创立而是前代人的产物的社会形式。因此，人们既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在生产力和社会形式方面，人是没有意志自由可言的。

虽然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意志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自由，因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并非意志的自由，而是理性判断的自由；或者说，自由并不是意志的属性，而是理性的本质规定。斯宾诺莎说：“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斯宾诺莎，1958年，第222页）只受情感支配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出于无知而盲目地选择和行动着，却给无知和盲目赋予了意志自由的美名，这是奴隶的表现。自由人知道自己在做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追求他所最愿望的对象即实现自我内在本性或自由。但自由人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他行为的背后没有原因在决定着他，他知道他行动的原因只在他自身之内，即他自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是他行动和存在的唯一原因，“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同上，第222-223页）人的自由在于他所想、所欲和所为的充分原因在他自身之内，即在他的理性判断和他的自我保持的力量之内。而要想让自身内在的固有本性成为自己行动的

唯一原因，首先要做的就是用理性来认识自身的内在本性，并且用理性来认识外部自然，使外部自然服务于自身的内在本性的实现，最终实现自由。

与斯宾诺莎相似，恩格斯也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456页）虽然这是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并且仍然把这种理性判断的自由称之为意志自由，但实际上这种通过理性认识来支配自身和外物的自由已经超出了意志自由的范围，因为认识和支配外物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不是意志选择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虽然不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人能够通过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支配生产力为人的自我实现或自由服务。因此，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某种程度上都否定了意志自由，但确立了理性判断的自由。

二、从物役到物化、物象化

在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看来，与自由相对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奴役，是外物对人的奴役。斯宾诺莎对奴役的界定是“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情感作为身体的感触其实质是外物对人的影响：人们总是为得到某物而欢喜，为失去某物而悲伤，为尚未得到某物而心怀希望，为将要失去某物而感到恐惧。斯宾诺莎虽然从人的心理出发来定义奴役，但从情感的实质出发我们发现，人被情感（希望和恐惧，喜悦与痛苦等）所奴役就意味着人被外物所支配，其存在和行为被外物所决定，因而失去了自主的权利，“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斯宾诺莎，1958年，第166页）所以斯宾诺莎的奴役概念并不仅仅是人的内心的状态，更多的是指人与外物之间的关系。他所谓命运，就是指外在于人的必然性或强制，在命运的支配之下，人不是在进行理性的判断，而是受情感的左右。这样的人认识不到自身内在固有的本性为何物，其行动也便仅仅出于外物的需要，其存在也便依赖于外物。外物对人的支配就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或命运。一旦有他人（如教士和君主）开始利用人们对外物的情感为他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话，人们的存在也就只能依赖于他人的专断统治，其行动依赖于他人的意志，“自由的对立面不是必然性而是奴役，奴役意味着专断的统治或依赖于他人的意志”。（Smith, p. 146）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宗教是人的情感尤其是恐惧的产物，专制统治利用宗教来控制人的情感，以使人们失去理性和自主，其行动也就不再出于自身本性而变成只为君主利益而卖命的奴隶，“专制政治的秘诀主要是欺瞒人民，用宗教的美丽的外衣来套在用以压倒民众的畏惧的外面，这样人民既可英勇地为安全而战，也可英勇地为奴隶制度而战”。（斯宾诺莎，1963年，第11页）

与马克思相比，斯宾诺莎并没有区分作为自然之物的物（Ding）与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的物象（Sache），他所使用的外物（res）概念实际上兼具前述两种物的意义。马克思则不仅区分了物和物象，并且关注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物象是如何以外在于人的自然物的方式对人进行专断统治的现象，即物象化（Versachlichung）或物化（Verdinglichung）现象。物象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象（如分工、生产力、商品、货币、资本等）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而物化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之后，出于物象的独立化和异己化，人们又进一步把物象错认为外在于人并支配于人的自然之物。总的说来，这两个现象在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中是共生的，或者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首先,劳动分工的固定化,使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偶然性的自然出身,那么分工对于人来说就不是由他驾驭的、内在的力量,而是一种压迫着人的、“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分工本来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并且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却由于分工的固定化使分工最终成为外在于人并统治人、控制人的力量,似乎它并非人的活动产物而是自然形成的物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其次,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生产力,只要这种共同活动不是人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生产力就不是人们联合起来的、内在的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同上,第86页);生产力是人的共同活动的产物即一种物象,最终却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人们意愿和行为的、不受人们驾驭的独立力量,似乎生产力是人之外的自然之物一般,支配着人的存在与行动。

再次,在商品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劳动产品的对象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劳动被反映为“物象的形式”(Sachliche Form),并被错认为“物(Dinge)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参见马克思,2004年a,第89页,译文有改动;Vgl. MEGA2, II/6, S. 103)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社会关系,以人的活动的产物如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严重性的后果就是,本来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的客观的经济力量却成为独立于人的外在力量,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东西。也因此使人们把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错认为是人之外的自然之物,把市场规律视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正是由于人的关系以物象的关系呈现,所以物象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自然规律”和“盲目的必然性”就会支配着人的活动,马克思说:“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马克思,2004年b,第941页,译文有改动;Vgl. MEGA2, II/15, S. 805)

最后,资本家、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物象的人格化,对社会广大雇佣工人加以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格(Personen),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2004年a,第10页,译文有改动;Vgl. MEGA2, II/6, S. 67)这是物象化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前提下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一个阶级作为物象的人格或代言人,从社会中分裂出去,并且与社会其他阶级相对立;对于社会广大雇佣工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则是外在的、异己的支配力量。资本家、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源于社会关系的物象化;社会关系以物象的形式出现,那么谁掌握了物象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每个个人以物象(Sache)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译文有改动;Vgl. MEGA2, I/1.1, S. 90)在物象化的市场经济中,货币、资本等物象成为人人竞相追求和膜拜的神,人的价值要远远低于物象-神的价值,甚至为了货币和资本的利益而牺牲人的价值的现象也会发生,物象化最终导致人的价值的贬低乃至虚无。

总之,无论是劳动分工、生产力还是商品、货币、资本,它们原本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作为物象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表现出独立于人并支配人的、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这是物化和物象化的体现,同时也是斯宾诺莎所言的外在必然性的支配、命运的宰割或物役。在物化和物象化状态之中,人受到了日渐独立于人的控制之外的物象的支配,人必须遵循物象的法则,仿佛他们在遵循自然规律一

般。同时人越来越依赖于物象才能生存和活动。现代人需要普遍地处理物象，在分工之中劳动，在商品世界中生活，挣得货币才能生存，资本生殖了社会才能运转。社会对待人就越来越如同对待自然之物一般精确化、程序化、制度化、“对事不对人”化，人的内在自我规定就越来越不受到社会的重视，“个人的个性被排斥在社会过程之外，成了完全个人的事情，或者与社会化过程对立的東西”（刘森林，第278页），自由的实现与物化、物象化社会呈现出相对立的局面。

在广松涉看来，正是由于物象化的出现，人被外在必然性或命运所支配，所以社会历史才呈现出某种“自然规律”，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才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由于这个物象化的机制，才出现了历史的规律性的进展”。（广松涉，第99页）言下之意，只有物或物象才有必然性可言，人和人的自由本身没有规律可言，历史规律是物象化了的社会的规律，是物象的规律。历史规律只是必然王国的法则，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跳跃同时也是消除历史规律的时刻。广松涉的理解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物象化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问题。从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段的划分来看，物象化的社会或“以物象的（sachliche）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persönliche）独立性”社会形态，尚且在时间上后于“人格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而历史规律却不仅仅发生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同时，作为第三个阶段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译文有改动；Vgl. MEGA2, I/1.1, S. 90-91），也绝非要排除一切物象化，共产主义社会要继承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也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人的自由才能够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消除的是物化，即消除那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自然物的关系的错认。因为共产主义使人重新掌握了物象的力量，消除了社会分工、生产力的自发性，成为人们自愿参与的社会活动；物象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支配力量，因而也就不会再将物象错认为外在于人的自然之物。

总之，物化、物象化不仅仅具有与自由相对立的面向，它还有促进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我实现赢得越来越多闲暇，从而为自由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的一面，“物化、物象化并不完全就是人的丧失，却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层面和维度上表现为人的实现”。（刘森林，第283页）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彻底消除物象化，而是如何使物象化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逐渐外在于人的物象的力量，再一次由人所掌握和支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力量。这正是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在应对物和物象对人的奴役时所采取的措施，使外在必然性内化为人的内在力量的延伸，使外在的物或物象的力量成为人的内在力量。

三、通向自由之路：外在必然性的内化

斯宾诺莎虽然指出了外物奴役人的可能性，但他并不认为人的内在本性的实现能够脱离外物的存在，人的自我保持尤其是身体的新陈代谢需要外物的维持，“为了保持自我存在起见，我们决不能对外界毫无所需，我们决不能与外界事物完全断绝往来而孤立生存”。（斯宾诺莎，1958年，第184页）人的存在与行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物，但人应该如何既能让外物维持人的自我保持，同时又能避免外物阻碍人的自由的实现呢？换成马克思的术语就是，应该如何既能保证物象化所带来的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又能避免物象化对人的自由造成阻碍呢？

斯宾诺莎诉诸于理性对情感的控制，不因外物的得失而感到悲喜，不受情感的左右。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只要心灵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同上，第243页）外物的得到与失去都有其原因，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盲目地为得到而欢喜、为失去而悲伤，为尚未得到而希望、为将要失去而恐惧，如此人就可以冷静地认识到自

身本性，并从自身内在本性出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从容地把外物当作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有力地为本性的实现而服务，“心灵认识的事物愈多，便愈知道它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发展……如果心灵对于自然法则的知识愈增加，则它就更易于抑制它自身使它不要驰鹜于无用的东西”。（斯宾诺莎，1960年，第34页）

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一样都强调理性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重要作用，但斯宾诺莎以理化情的教导多少有些悲观认命的色彩。斯宾诺莎认为对于那些外在于我们本性的事情即“命运中的幸与不幸”都要同样地“去镇静地对待和忍受”。（参见斯宾诺莎，1958年，第94页）马克思则更加积极地运用理性，他不仅要求用理性去认识外物，还要求以理性来积极支配外物以为人的自由服务；理性地认识到物象的本质和规律，并把物象纳入到人的控制和安排之中，为人的自我规定的实现服务。马克思说：“人格的（persönliche）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象的（sachlich）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象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119页，译文有改动；Vgl. Marx/Engels, S. 74）一个由每个人自愿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做到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外在于人的、支配人的社会生产力重新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个人”自己的手中，那时生产力便不再是异己的、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力量或“自然规律”，而完全成为实现人的一切自我规定的内在力量。那时，以往控制和支配人的、异己的“社会自然史”的规律，人们不仅能够理性地认识到它们并且还能将其熟练运用，使之听从于人的支配，为人的自由的实现、自我规定的实现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634页）

但是，自由王国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必然王国的消失。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其社会生产，而生产领域、生产力始终都是一个物象化的必然王国，效率原则、精确化、程序化与“对事不对人”等原则在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原则并不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有所改变。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有着太多的教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低效率的生产，更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不需要制度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彻底消除一切物象化，物象化本身并非纯然的贬义词，至少马克思并不要求改变生产领域的物象化状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尽量地缩短工作日，尽量地使物象化不至于支配人的更多时间、支配生产以外的其他生活领域，使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在其他生活领域之内去自由发展自己。但工作日的缩短、闲暇的增多，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祛物象化，其前提仍然是物象化的生产领域的高效率。另外，我们中国当下的问题，更多的不是物象化太严重了，而是物象化还不足够，我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要更加正视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象化机制的张力结构，我们不能因为物象化的弊端而要求彻底消除物象化，而看不到物象化对于人的自由发展所带来的进步意义。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领域的物象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它们物象化的目的却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象化生产的自觉的目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和物象化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虽然每个人在其中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其物化和物象化的生产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它虽然为人的自由发展奠定了有益的物质基础，但这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它的本意绝不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个性和自由只是个人自己的事情，社会并不关心人的个性和自由；而在共产主义社会

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最高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从我们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生产力虽然提高了，但整个国家和社会对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的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和支持却是不足的。

综上，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对自由和必然的矛盾的化解方式——人把物或物象的外在必然性变成自己的力量，变成人的内在必然性的实现手段——所带来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人不可能彻底摆脱物或物象，不依赖于外物而生存。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绝对地摆脱物或物象的必然性，不可能彻底地消除物象化。人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减小物化和物象化对生活的影响时间和范围，同时利用物象化的高效生产为人的生活服务。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中，理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既需要它去清醒地认识自己内在本性的必然性，也需要它去认识外在必然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掌握和支配外在必然性为自由的实现服务。

参考文献

- 广松涉，2002年：《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 康德，2003年：《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 刘森林，2013年：《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2004年a：《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 2004年b：《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斯宾诺莎，1958年：《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 1960年：《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 1963年：《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 Marx/Engels, 1969,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n *MEW*, Bd. 3, Berlin: Dietz Verlag.
- MEGA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1976, 1987, 2004, Berlin: Dietz Verlag.
- Rubel, M., 1990, "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in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 3rd vol., ed. by B. Jessop and B. C. Malcol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mith, S. B., 2003, *Spinoza's Book of Life: Freedom and Redemption in the Eth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Yovel, Y., 1989,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2nd vo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黄慧珍